

●展覽現場



●旗袍是摩登女性表達自我的語言。

自1910年代起跨度超一個世紀的旗袍及各類時尚珍品展——「摩登華影：海派旗袍與百年時尚」專題展覽正在上海博物館展出，呈現共計近306件/組珍品。其中涵蓋從知名音樂人張信哲所藏5,000餘件旗袍中甄選出的63件/套；並首次在全球視野下回眸海派旗袍的演進歷程，輔以摩登生活、穿搭場合作為敘事線索，從滬上弄堂的綽約風華，到世界舞台的東方符號，旗袍的流變，正是中華服飾現代化轉型的縮影。

●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
記者 章羅蘭 上海報導

●繪染高尾花紋藍綢旗袍

上海博物館供圖



精選張信哲珍藏與貝洽捐贈

上海博物館海派旗袍展 演繹東方時尚

自近代以來，上海逐漸成為東西方美學與創意交融的舞台，形成獨具特色的都市風貌與審美體系。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，「海派文化」蓬勃興起，海派旗袍的演進與風靡，《良友》畫報與《玲瓏》雜誌引領的生活方式，以及銀幕中流淌的現代氣息，共同構築了上海鮮明的時尚風格，使其成為東方矚目的潮流中心。進入二十一世紀，這座城市仍以持續的創新精神，推動着時尚語境的當代重塑。上海博物館館長褚曉波認為，作為承載着百年風尚的東方霓裳，海派旗袍是上海「開放、創新、包容」城市品格的鮮活見證，它既承載着民族文化自信的重構歷程，也讓東方智慧在全球語境裏煥發出永恒的魅力。

「情歌王子」的旗袍情緣

據介紹，本次展覽的核心展品，精選自貝洽（著名建築師貝聿銘的妹妹）的無私捐贈和張信哲的豐富收藏，其中從貝洽捐贈的近300件套服飾等藏品中精選64件/套，從張信哲所藏5,000餘件旗袍中甄選63件/套，輔助時尚女鞋和手包10件/組，月份牌和廣告畫9件，同時借展上海市歷史博物館（上海革命歷史博物館）、上海宋慶齡故居紀念館、上海汽車博物館等相關機構藏品，共計21件/套。展覽還匯聚迪奧13件/套、香奈兒13件/套、古馳14件等國際知名品牌展品共計40件，以及內地百年老字號老鳳祥的珍品31件/套。

展品中來自張信哲的珍藏，時間跨度多為上世紀20年代至40年代，這只是其5,000餘件旗袍收藏的「冰山一角」。說起此項愛好的起源，「情歌王子」分享了一則童年故事。原來，張信哲的外婆是精緻旗袍女郎，一次家中遇竊，損失居然悉數為旗袍，「那時候我才知道這些旗袍這麼貴，就開始想要好好研究一下。」

「除了受家中長輩的影響，最原始的驅動力其實很簡



▲裁縫記賬本

▶金黃色地黑色仿蕾絲紋印花布旗袍套裝 上海博物館供圖



名媛蔣士雲的時尚風華

今次展覽中20世紀40年代至80、90年代的展品，主要為貝洽母親蔣士雲的珍貴旗袍及配飾。2017年，貝洽致函上海博物館，表示願意將其母親蔣士雲收藏的274件旗袍服



●展覽現場



▲抽象彩格印花塔夫綢旗袍 上海博物館供圖



▲秋香綠地摺綠紋印花綢旗袍 上海博物館供圖

飾無償捐贈給上博。貝洽撰文回憶，20世紀30年代，母親在上海過着流光溢彩的生活，處處是她綻放光彩的舞台。作為當時的文化藝術中心，上海為她提供了豐富的社交平台。住家裁縫師傅每天傍晚都會為她製作好一件新旗袍，供她出席當晚的宴會。因此，每個場合都有對應的禮服，只是由於數量眾多，已難以逐件考證其具體用途。母親既能輕鬆駕馭剪裁精美的傳統旗袍，也能穿出西方改良款式的風采。

與貝祖洽結婚後，蔣士雲追尋時尚的步伐邁向了世界各地。「我記得曾隨母親穿梭於紐約與巴黎的面料店，她總說：『剪裁合體的旗袍，或一件量身定製的外套，需要關注它的線條與細節——這樣的衣裳才永遠不會過時。』我們遍訪各地有特色的布料店，尋覓獨特的蕾絲、絲綢或珍稀羊毛料，並頻頻光顧鞋店、包店和首飾店。曾為家中裁縫的楊師傅為避戰亂已移居香港。20世紀60年代，每當母親造訪這座城市時，都會將她從美國及其他國際都市搜集的布料帶給楊師傅，二人共同為四季各類場合設計製作服裝。」

「移居美國後，母親入鄉隨俗，將東方元素巧妙地運用於各種場合的穿搭，」貝洽寫道，「在紐約社交場合，她總以旗袍搭配一件相同面料的時尚外套。晚年時，她常對我說：『你必須打扮自己，獨具自我風采。』即便年過百歲，她依然保持着衣着得體、儀態端莊，始終追求精緻與舒適的統一。」

策展人于穎 談旗袍風尚的形塑與推廣

上海博物館工藝研究部研究員、策展人于穎認為，旗袍風尚的興起，得益於多方力量的共同推動。知識分子對於旗袍的誕生、推崇甚至引領都是極為重要的。她們以獨到的審美眼光與主動的文化實踐，深度參與其形塑與推廣過程。思想先驅與名門閨秀如宋慶齡、林徽因、文藝先鋒如張愛玲、陸小曼等，以旗袍傳遞出個性與智慧並存的東方新女性形象；而陸小曼、唐瑛等文藝名媛，則通過定製設計與公開穿着，將旗袍推入時尚前沿，使之成為品位與身份的象徵。其中，陸小曼在徐志摩的支持下發起並於1927年在上海創立的「雲裳時裝公司」，便是這一現象的典型代表。

大眾傳媒的蓬勃發展，進一步加速了旗袍審美體系的形成與傳播。《良友》《玲瓏》等現代出版物不僅展示最新款式，更主動倡導改良理念，推動旗袍從寬直走向修身，從保守走向開放。月份牌與廣告畫上則以細膩筆觸勾勒出穿着旗袍的摩登女性形象；她們時髦優雅、曲線玲瓏，這些圖像在商業與藝術的雙重推動下深入人心，使新款旗袍、西式配飾成為滬上女性競相追隨的時尚元素。

在款式演變上，海派旗袍展現出非凡的融合智慧，大膽吸收西式剪裁技術與廓形設計美學，讓東方服飾的飄逸與西方審美的曲線相得益彰。蕾絲綴邊、透明綉紗、幾何紋樣等細節的引入，進一步拓展了旗袍的表現力，使其在不同場合皆能展現恰如其分的風采。

與此同時，電影這一新興媒介放大了旗袍的視覺影響力，頂流明星如胡蝶的明媚、阮玲玉的婉約，通過銀幕上流動的光影，把旗袍的萬千風情刻入公眾記憶，使之成為可觸可感的「摩登標誌」。旗袍自閩閩走向市井，由上海輻射全國，標誌着一種新審美意識與社會身份的認知。

「20世紀上半葉的上海，旗袍不僅是服飾，更是一種隨時間流轉的生活藝術，從晨光熹微到夜色深沉，一襲旗袍在不同時空中的形態變換，宛若萬花筒中的鏡像，折射出現代女性身份的多元轉換與海派文化與時俱進的生動姿態，」于穎說，「在社交場合，洋裝禮服與海派旗袍並行不悖，女士們可能在晚宴上身着西式塔夫綢長裙，次日的茶會便換上一條剪裁精良的絲絨旗袍，這種着裝選擇上的自由與混搭，本身就是海派生活方式的體現。」



●藏青色陰丹士林布旗袍

上海博物館供圖



●陰丹士林布廣告

郵壇茶座

中國古代青銅器從夏至漢，兩千餘年創造的器物洋洋大觀，青銅器上承載了先祖的精神追求，其鑄造之精、蘊意之深、造型之美、紋飾之麗，令後人心馳神往，目眩神迷。

青銅器走到漢代，已經是最後的絕響。青銅器作為禮器的作用已完全喪失，以日用器為主。雖說青銅器在漢代日用化，但絕不是沒有出類拔萃的精品，例如銅奔馬是漢代藝術的代表，過去稱「馬踏飛燕」，是國寶級文物。

1969年10月，甘肅武威城北雷台下一座東漢晚期墓，出土了一件銅奔馬，高34.5厘米，長45厘米，寬10.1厘米。馬頭略微向左揚，頭上的環珞在飄動，長尾飄舉，尾梢還打了一個結，昂首嘶鳴，三足騰空，作飛躍奔馳狀。為了充分顯示駿馬飛奔的生動形象，採用誇張的手法，把奔馬全身體量的着力點集中在一足之上，同時又

舉世矚目的東漢銅馬郵票

巧妙地利用展翅的飛鳥來增加它的底面積，以平衡整個造型的重心，並作為銅奔馬的基座。落在馬蹄下的飛鳥圓睜雙眼，驚駭得回首張望，以顯示奔馬的速度超過飛鳥的速度。這件精美的銅奔馬被稱為「馬踏飛燕」，亦稱「馬踏飛燕」。1983年12月，國家旅遊局以此作為中國旅遊標誌。

馬踏飛燕又名馬超龍雀、銅奔馬、凌雲奔馬等，為東漢青銅器，1969年出土於甘肅省武威市雷台漢墓。東漢時期鎮守張掖的軍事長官張某及其妻合葬墓中出土，現藏甘肅省博物館。馬踏飛燕作於公元220年前後，高34.5厘米，長41厘米。奔馬正昂首嘶鳴，舉足騰躍，一隻蹄踏在一隻飛翔的燕子身上。從力學上分析，《馬踏飛燕》找到了重心落點，實現穩定性。

2003年，四川綿陽博物館舉辦的「國之大用——綿陽漢

馬陳列」將館藏的各類涉及馬、騎士、馬夫、馬具、馬車等文物集中展示。將兩千年前蜀國人的用馬、養馬、馴馬、愛馬一覽無餘地告訴今天的我們。2003年，「中國2003第十六屆亞洲國際郵票展覽」在綿陽舉辦，「中國2003第十六屆亞洲國際郵票展覽」特別發行郵票選用了1990年2月14日出土於四川綿陽市何家山東漢崖墓的「東漢銅馬」。它是綿陽博物館館藏的迄今為止發現的中國最大漢代青銅馬。

據史料記載，中原馬的出現最早始於商代晚期，甲骨文記載西北的「戎或」最先將馬車用到了戰爭中，馬匹進入中原人的視線，成為一種騎載的動物。隨着秦國統一中國，中原馬文化融入四川盆地並在當地形成獨特文化現象。

●文：李毅民（高級工程師、中華全國集郵聯合會會士、《收藏》雜誌原主編。）



●東漢銅奔馬郵票。